

2021年党史国史研究新进展

辛逸 董龙 赵懿

本综述是笔者在浏览数百篇2021年党史、国史论文的基础上，对两史研究一些“新进展”的简单、粗糙的编写。自忖本文既没能全面反映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甚至没有实现对其主要成就的准确表达。

本文主要关注两史研究中有学术贡献的论文。这类文章或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准确的对话对象，通篇论证一个创见；或引用若干新见史料，至少以一手资料为主要支撑；或试用新方法，采用新的视角。有些文章叙述一个老故事、得出旧结论，却提供了若干鲜为人知并给人以启发的历史细节，也为笔者所乐见；有的文章虽有新颖的题目和研究对象，但在见解、史料、方法甚至呈现历史细节等方面却未见真正的学术贡献。

受能力和篇幅所限，挂一漏万甚至漏掉了有重要学术贡献的佳作；对一些作品的理解有误甚至不符合其原意；对有些文章未做完整、全面的概述，只集中介绍文中的一段新史料或一个次级结论。以上种种舛漏包括还未被笔者意识到的其他问题，均由笔者负责。

一、总论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多家专业期刊推出纪念专栏或笔谈。其中比较集中的议题，是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及其归属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党史应该属于历史学科。只有明确党史历史学科的属性，才能划清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边界，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取得符合史学规范并得到整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学术成就。作为对如何构建党史一级学科的回答，有学者提出党史学科应包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党的理论发展史和党的建设史。在如何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讨论中，有作者提出应该从战时环境、基本人性和长时段等三个维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苏区史。关于三线建设，有人主张以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对应地研判三线建设中的时间、空间、社会和主客位。在访谈三线建设当事人时，即使是在两人对谈的封闭环境中，访谈人依然能够感觉到，“国家在场、单位在场、他人在场”。近年来，关于日本学界中共党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最新进展，也有比较全面的介绍。

本年党史人物研究集中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评述。研究者使用新见一手资料，对陈独秀1921年、1922年在上海两次被捕的原因进行了新解读；由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重脉络的分析，引出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日俄渠道和欧美渠道的讨论；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对秘鲁“光辉道路”的重要影响，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拓展；有学者分析了张申府自由主义信念、个人主义个性与其对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服膺和对党内集体主义的崇敬之间的张力；美国学者对张太雷革命活动的考订，亦是本年党史人物研究中的亮点。

在党史史料挖掘与整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手册《秘密工作常识》在法国外交档案馆

被发现;对日本防卫省防卫所藏有关冀察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共组织机构、军民关系、战略战术、财政与经济、减租减息、文化教育、剪头放足等方面的原始文献和日军情报的系统介绍;对美国中情局有关涉华情报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均是值得推介的。

(一)理论与方法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就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建设,举办“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杨凤城建议,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共党史应包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党的理论发展史和党的建设史。由此构成“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这已成为党史学界的学术共识。上述三个二级学科,基本上能体现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管党治党(史)的三位一体架构,且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积累和基础。除上述三个主干学科外,可以考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二级学科纳入其中^①。何志明认为,中共党史模糊的学科归属,导致其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难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明确党史学科归属。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党史研究自身的历史学特性以及中共党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是党史研究者应该淡化学科边界,以更加开放和严谨的心态,积极提倡跨学科研究,大力引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党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与旨趣,最终获得其他学科的认同^②。吴志军主张,既然党史研究的学术安排具有显著的国情特殊性,其学科规划的设置和建设不妨充分尊重和发扬这种特殊性,让党史研究获得一种综合学科建设层面上的特殊独立性。如果党史学界无视这种特殊性,不基于这种特殊性来讨论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③。刘雨亭指出,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产品的通约性以及知识生产的协作性。在此基础上,中共党史学科才能够有效吸纳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学科互动中呈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塑造作用,从而真正发挥党史学科的学术生产能力^④。

中共党史专业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存争议。李金铮认为,党史归属历史学科更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党史专业最初就设在历史系,今天从其他学科重新拉回到历史学,不过是重归原位。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保证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作者注意到,近些年的党史学界,包括马院、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已和传统党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规范化、学术化大大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凡是研究比较深入、取得较好成绩的,大都既接受了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党史学的训练,又汲取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此为中共党史学界的一大变化。但至今仍有思维陈旧者,自以为是、画地为牢,武断地指责这个不是党史题目,那个不是党史题目。在此意识之下,有的党史论文,包括博士论文,仍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浮于表面、大而无物、重复劳动,几无学术性可言^⑤。

《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笔谈。张海鹏认为,以农村包

①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何志明:《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③ 吴志军:《不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刘雨亭:《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⑤ 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区别于俄国革命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将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①。金以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通过游击战方式，陆续在农村建立起一批独立的根据地，最终逐步统一成中央政权。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都可以从抗日根据地找到它的雏形^②。郭若平指出，在历史认识论中，历史时间显然不同于自然时间。对于党史书写来说，时间概念不应当被看成意指单向度的直线流变，而应被看成蕴含交叉、覆盖、转换等多重变化的社会活动时间。在处理特定史事过程中，这种时间概念并不是处在动态性与静态性的辩证关系中。有些以档案为史料基础的个案研究，往往不能将档案蕴含的断裂性时间，合理地对接中共党史的整体性表征的连续性时间^③。左玉河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念，妥善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斗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为抗战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中共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如减租减息政策、三三制政权等，就是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的集中体现^④。张太原指出，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记载、看法和评论，很多情况下，其情其意或真，其理则妄。从某个角度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了解中共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人看法的一致之处，应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长所在^⑤。

《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推出“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笔谈”。周良书将党史的研究范式归纳为“革命史”与“现代化”、“单线史”与“复线史”、“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演进和变迁。改革开放前，党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现代化”范式是随改革开放兴起的分析框架。这两种范式不是截然对立的，均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复线史”的叙事方式试图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展现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但它并非有意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也无法颠覆“单线史”所揭示的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小历史”研究范式，通过对党史叙事中某个事件、村庄或学校等个案的分析，把微观层面作为党史研究的着力点，弥补党史研究中习惯于处理“宏大叙事”、忽视对历史细节进行深刻分析的不足^⑥。王广义认为，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的研究，应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其反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底层看历史”，从中找出更加符合客观历史的规律。“眼光向下”，重新审视历史，展现出基层社会各阶层的分化、重组其日常心态和生活，把社会下层群众的活动同上层人物的活动连接起来，把广大民众的生活同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从整体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党史研究还需要内外结合，既要从国外的角度看中国，也要从中国的立场看国外^⑦。

《中共党史研究》本年第6期，刊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继续深化与发展方向”笔谈的第二部分。瞿俊认为，史学的“求真”，除了“求真相”，还要“求真实”，二者相辅相成，

① 张海鹏：《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金以林：《游击战略与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再思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郭若平：《百年党史书写：时间、记忆与阐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④ 左玉河：《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调整中的理论思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张太原：《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⑥ 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⑦ 王广义：《时间·空间·学科：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视域》，《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联结互补,方能切实推进党史研究。因为,蕴涵细节“真相”的史料很多时候并不能够直接得出“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恰恰需要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得出。只有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真正逼近“历史真相”^①。游海华提出应该从战时环境、基本人性和长时段等三个维度审视和研究苏区史。忽视战时环境极易产生以下问题。一是拔高评价、易致悖论。即认为战时的各项工作,反而比和平时期的资源更多、民众素质较好。二是贬低评价、无视史实。如将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领导制度看作“家长制”。三是无视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的差别,将苏区前期的战时经验照搬到其执政时期,结果问题甚多。以人性的复杂性研究苏区史,从常情、常理、常性出发去发掘苏区反常情、反常理、反常性的社会现象。如革命大潮初起时地富子弟带头闹革命、一度失序的婚恋现象、共耕制度和集体农场的尝试等。用长时段研究苏区史,一是需要考察苏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分析各边区民众的生存环境,以及其产权、交易、教育、信仰、卫生、金融、行政等制度。二是分析苏区革命既受制于区域自身发展的结构,也深受明清以来世界与中国社会大变迁潮流的影响和制约。三是考察苏区革命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及其制度创新、农村经济社会的变革模式,以及苏区新型社会关系及观念对中国后来的影响^②。周俊认为,有关党内交通的研究,概述、回忆性质的文章偏多,实证研究较少;个案研究虽逐渐增加,但能勾勒全局的通史性著作尚未面世;对党内交通在1949年以后的延续,关注太少;缺乏跨学科的理论对话^③。

三线建设研究近年渐成热点,多种学刊均有关注。徐有威对三线建设民间文献进行了界定。凡属小三线建设时期的,无论其作者是否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只要是记述与小三线建设有关的、并且保存在民间的文献,都可称之为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包括厂志、日记、工作笔记和自印本回忆录等^④。

张勇认为,时间、空间、社会、主客位等四个基本学科元素组合在一起,可构建起三线建设研究的多学科体系。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这四门对应的学科各有侧重,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上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作者主张,研究者需要从长时段出发,将三线建设置于全球史、整体史的背景下分析其成因和影响。将目光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甚至1949年之前,探寻单位制的渊源、工业建设的形成;将目光延伸至1980年代之后,分析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三线社区的转型与城乡关系的变迁。还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对三线建设进行比较研究。纵向比较三线建设与抗战内迁、明代屯堡移民;横向比较可与新疆建设兵团、三峡移民等。三线建设的对话对象,既可是“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也可是工业建设、城市化、社区发展、城乡关系、西部大开发等^⑤。

周晓虹在做三线建设口述时注意到,口述史是一种个体叙事,但叙事的机理却是由社会建构的。不仅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叙事成分的重要与否、前后顺序、意义内涵,而且什么能说、什么可以肯定、什么必须遗忘也是由社会结构及权力关系决定的。这说明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即使口述对象少则十年,多则二十甚至三十年前就已退休,但他们依旧在可能涉及早已过时的“秘密”时依然讳莫如深、守口如瓶。当只有访谈人与亲历者两人对谈时,你也能够发现

① 瞿俊:《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游海华:《战时环境、人性、长时段:苏区史研究应有的维度》,《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③ 周俊:《组织的血脉:党内交通研究的再检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徐有威:《民间文献和小三线建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⑤ 张勇:《四维同构:三线建设多学科综合研究之构架》,《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国家在场、单位在场、他人在场^①。

郭若平将《向导》周刊的时评文章归类或命名为反应性史料，并从理论与方法上对其进行了辨析。这些时评已经蕴含对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折射出时人对当时政治事态所秉持的立场与观点，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价值并不低于一手史料。郭文认为，从不同层面观察中共党史的史事细节，并不等同于取缔传统的“事实史料/研究分析”的二元模式，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以“事实史料/史事表征/研究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向导》时评史料起着的正是“史事表征”的史学功能。用这种史学功能解释中共早期历史，不但可以充分利用一切原始史料，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那些对史事作出反应的史料^②。

概念史研究一般多关注新概念的引入、形成及其流变的过程。李里峰则更加强调，概念史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基本定型的概念是如何指引政治实践，如何成为参与和引领社会政治变迁之“要素”的。1920年代不仅是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尤其是与革命相关的基本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也是这些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行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见证了概念/话语竞争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换过程，彰显了概念引领政治实践的巨大能量，是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一个适宜的切入口^③。

侯竹青从概念史视角对中共纪念史进行研究。在纪念活动中，中共对核心概念的选择和阐释是中共政治理论构成和变迁的表征，其对核心概念的强调和重复也在无形中传播着中共的政治思想，推动着中共的政治实践。侯文进一步指出，一个概念从共时性看可能不是核心概念或基本概念，但是从思想的历时性来看却是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者既要注意特定时间内概念与思想的同步性，也要重视特定时间内概念既有的批判性变化；既要注意中共纪念活动中文本概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还要注意研究纪念对象的概念化^④。

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过于侧重革命史而对其建设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王先明提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历史，也非冲突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统一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时代命题。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长程上看，建设历史长于革命的历史，建设内涵远大于革命内涵；从历史进程的统一性而言，革命与建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而我们的近现代史研究，多年来只是聚焦于革命史研究而相对疏离了建设史。在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如何拓展和深化近代中国建设史论题，是我们必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⑤。

日本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近年有很大的起色。张屹、徐家林对此有比较专业和全面的介绍。张文发现，日本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共产党”为标题、关键词的研究专著、资料集与调查报告等就不少于70部，其他专题性的党史研究成果，难以完全统计。然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中文翻译与出版却乏善可陈、屈指可数。日本中共党史研究者可分为两类。一是由战时情报人员转为中共党史学者。例如，草野文男著有《中国边区研究》等；波多野乾一有《红色中国的再探讨》《毛泽东与中国红星》《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等书，并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集成》7卷。二是学术研究出身的党史学者。宇野重昭著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中

① 周晓虹：《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郭若平：《〈向导〉的向导：时评反应中的中共早期历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③ 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史林》2021年第1期。

④ 侯竹青：《概念史视角下的中共纪念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3期。

⑤ 王先明：《革命与建设：20世纪中国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主线》，《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

国共产党：历史与真相》等。竹内实出版《毛泽东笔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等书。21世纪以来，日本党史研究的新特点：其一，强调历史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如高桥伸夫的《党与农民：中国农民革命再检讨》；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石田米子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等。其二，强调国家、社会与民众的互动过程。如祁建民的《中国的社会凝聚与国家权力：井冈山村落的历史变迁》；三好章的《摩擦与合作：新四军1937—1941年》；田中仁的《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等。其三，强调党史中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丸田孝志的《革命的仪式：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川瀬千春的《战争与年画》；小野寺史郎的《国旗·国歌·国庆：民族主义与象征的中国近代史》等^①。

国史分期历来有争议。朱佳木认为国史可分为五个时期：1949—1956年为中国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期；1956—1978年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或者说是突破苏联模式，试图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时期；1978—199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92—201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时期；2013年以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②。

(二) 人物研究

陈独秀1921年10月4日被捕，过去认为是因其违反《暂行新刑律》第221条和其中共领导人的身份。侯庆斌利用新见会审公廨判决书和法国领事馆档案等资料，认为陈独秀被捕并在12天后被释放的唯一理由，是陈独秀涉嫌在寓所经营未经注册的“秘密出版社”。这反映出中共一大前后，法租界的出版监管对中共早期宣传活动的干扰相对有限，客观上为中共建党和组织发展提供了机遇。1922年后法租界当局对陈独秀和共产党组织愈发重视。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区位优势不再明显^③。

侯庆斌本年另文考析了陈独秀1922年8月9日再次被捕的原因及其影响。作者认为，陈独秀这次被捕仅9天后被释放，其主要原因是法租界当局既试图维护社会秩序，又力求在中国国内政争中保持中立，避免成为反帝运动攻击的对象。侯文注意到，这年陈独秀案审结后法租界的政治环境一度非常严峻，危及中共的生存，成为是年10月和次年2月中共中央机构两度迁出上海法租界的背景^④。

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近年逐步超越传统党史范式，探寻李大钊思想的多重脉络。段炼认为，五四前期，李大钊不断调整认知世界与评价文明的价值尺度，形成了从“风俗保群”到“第三文明”的思想转变。五四后期，李大钊在反思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表征的西方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同时，通过对互助、合作、博爱的思考与实践，试图以此催生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文明主体——平民(大众)。基于对民初共和政治以及西方文明的失望，他又极力通过底层民众的不断革命与民主参与，以新文明的方式实现对代议制、立宪制度的超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1917年俄罗斯的两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从理论与实践上，共同整合了李大钊心目中对于寻求富强民族国家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⑤。

王磊发现，由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

① 张屹、徐家林：《异域之眼：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2期。

② 朱佳木：《再谈国史分期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③ 侯庆斌：《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事件探赜》，《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侯庆斌：《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事件考析》，《史林》2021年第6期。

⑤ 段炼：《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与“文明”》，《学术研究》2021年第3期。

卷,收录的《“五一”(MayDay)运动史》的正文及注释,存在十余处疏误或存疑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发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渠道的研究,呈现“三多三少”特点。对日俄渠道研究的较多,对欧美渠道研究的较少;就欧美渠道而言,对欧洲渠道研究的较多,对美国渠道研究的较少;就欧洲渠道而言,对勤工俭学群体研究的较多,对其他群体研究的较少。深化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渠道的研究,除继续加大对日俄渠道的研究外,还需深化对欧美渠道及其与日俄渠道比较的研究^①。

关于毛泽东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学界介绍有限且不够系统。高维谦对以秘鲁“光辉道路”为代表的拉美毛主义政党与组织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本土构建。“光辉道路”的创始人古日曼1965年初被秘鲁共产党派往中国学习。在中国他学习国际政治(主要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如何建立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他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等论断甚为欣赏,主张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联合秘鲁社会各界的力量推翻独裁政府。他认为秘鲁的国情与中国十分相似,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干涉使整个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光辉道路”发展的鼎盛时期,正式成员达到3000人左右^②。

李张容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记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历史认知与中共党史编撰三个方面。如今早已成为惯例的七一纪念源于毛泽东的提议;毛泽东的“十二人”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直接影响对一大代表人数的判断;毛泽东的相关回忆反映到了中共党史的编撰和内容之中。毛泽东的相关回忆足以搭建起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主体框架。即便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也无法改变或忽视他的记忆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更何况后来对比档案,再经过学术检验,他的回忆大体可靠,一些误记的内容也得到更正。如此,其记忆的影响便更为深远,也变得更加权威^③。

李放春考察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一词的俄国起源,梳理了瞿秋白关于领导权思想的译介情况。1923年,瞿秋白最早在《新青年》(季刊)上译介领导权思想,并新造了术语“领导权”。直到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领导权”作为hegemony一词的译词才最终确定。瞿秋白在这一跨语际的革命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李文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词语承载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程^④。

1932年10月31日,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董广认为,文章对左翼文艺运动中所执行的“左”的关门主义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反“左”文献。并佐证“第三种人”及“第三种文学”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辩证分析了文艺作品的价值与阶级性,成为张闻天个人思想从“左”到“反左”转变的起点。张文使“革命的小资电影”的命运从前景未卜到步入正途,事实上促成了左翼电影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走向^⑤。

张申府是中共建党早期的重要骨干。学界对张的研究比较薄弱。在中共“四大”上,他在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时与人争执,负气退党。雷颐发现,他不反对国共合作,但更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认为国共合作“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

① 王磊:《李大钊〈“五一”(MayDay)运动史〉校勘订补》,《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3期。

② 高维谦:《毛泽东思想对拉美地区文化政治的影响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2期。

③ 李张容:《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记忆》,《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李放春:《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董广:《张闻天与20世纪30年代“革命的小资电影”的命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段”。张申府后参加民盟创建，任民盟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华北总支负责人。又因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双方停战，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而被民盟开除。雷文认为，张申府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同时又是列宁建党学说的服膺者、宣传者，对以集体主义为目标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知识人来说，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更为尖锐和激烈^①。

学界对张太雷的认识，至今其事实真相模糊不清、历史评价褒贬不一。潘佐夫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分析众多档案、打印文件和张太雷的手迹，力求为其革命生涯提供一份较为全面的评述，并对张太雷若干有争议的史实进行考订。苗可秀(Kristin Mulready-Stone)认定，张太雷出席了192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致辞，入选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潘文认为，这次大会召开于1922年10月，张太雷应该是在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下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委的。1922年7月16—23日，张太雷参加中共二大，积极支持并促成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张太雷是领会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意义的第一个中国布尔什维克，也是最早关注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②。

(三) 史料挖掘与整理

192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该文件当时传播较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的党组织都有传达、学习的记录，但流传甚少。蒋杰在法国巴黎外交档案馆发现了《秘密工作常识》。这本小册子含封面共24页，约8700字，由“劈头语”“如何建立秘密机关”“如何举行秘密会议”“如何保存秘密文件”“秘密交通法”“认识敌人侦探及逃脱法”“如何化装”“散发传单及公开活动应注意之点”“向人宣传及介绍同志的方法和态度”“同志间的关系及态度”“如何安置侦探在敌人的机关中”“机关破毁及被捕后应注意之点”“对付叛徒或敌探的办法”“结论”等14个小节组成。实际上，此后中共秘密工作的“三化”“六要”原则，在该文件中已初具雏形。作者发现，与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当众大量抛撒传单的方式不同，该文件要求：“去散发时传单一次不要拿得太多，最多一次不要过十张。发时先将传单折好，最好是在人群中，乘人不意，后面放置入他的衣袋中”^③。

国内历史学界一直高度重视美国中情局涉华情报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但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却没有引起学界过多关注。赵继珂发现，在中情局《信息自由法》电子阅览室，以“中国宣传”为关键词可搜索《双周宣传指导》《每月预警评估：中国》《共产党宣传趋势》《外国广播信息谍报处每日报告》等报告，包含如何扩大美国对外宣传的建议，其中很多内容与中国相关。如，1949年底，中情局便通过解读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变动数据，判断出在中国电影市场美国已经被苏联完全替代。作者认为，系统梳理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为重绘冷战时期中国开展宣传活动的完整图谱提供了重要史料补充；同时有助于深化对美国文化冷战史、中情局发展史的研究。作者提醒，《信息自由法》虽要求中情局等相关机构定期解密历史文件，但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中很多敏感内容并未全部解密，一些页面被大段涂黑^④。

张屹、徐家林发现，通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可查询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的中共

① 雷颐：《张申府的困境：在个人与组织之间》，《学术界》2021年第3期。

② [美]亚历山大·潘佐夫：《张太雷与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 蒋杰：《法国所藏中共〈秘密工作常识〉的保存、内容与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赵继珂：《美国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文献。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辑的《中共军队(1936)》，介绍各地红军的基本情况，重点记载红军各部自1935年1月至10月期间的行动轨迹、重要战斗等。华北方面军参谋部1938年12月编辑的《晋察冀边区经济政策》，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大事记、晋察冀边区战时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及粮食政策等组成。华北方面军宣抚班汇编的《宣抚工作业务概要》，载有该班调查员三崎良一秘密潜入山西省和顺县，进行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形成“和顺报告”。该报告计6编，防卫研究所仅存4编。内容涉及县治行政、财政与经济、群众教育与文化工作、群众抗日团体与干部教育、村自卫队、游击队与敌后战场、中共秘密工作等。1940年5月形成的“冀中报告”认为，根据地形式上推动了普选与民意代表参政，由于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乡村政权被少数积极分子所左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合作社运动在组织民众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货币一元化政策及其边区券获得群众的支持；边区小学思想教育效果显著，很多小学生自愿帮助中共收集传递情报。“冀南报告”中，统计图表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包括各类群众组织的人员名册、各类机关及会议制度一览表，区公所、村公所群众选举情况，抗战军人家属优待、县内自然灾害救济、剪发放足等统计图表。《治安强化运动指针》的第一部分，包括“中共对外政策的破绽”“新民主主义的矛盾”“抗战中的矛盾”“中共与共军是东亚解放的大敌”“贫困地区真相”“国共斗争真相”“对中共思想战的前途”等^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较往年呈现若干特点或趋势。一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得到更为广泛的探讨。有学者论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著作，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引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还有学者分析了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具有的国际性，对中共革命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中共革命的微观考察更加深入。有研究揭示了“党指挥枪”原则在微观和日常层面的含义，即“党对枪支分配的绝对控制”。八路军基层干部的“个人阅读史”成为研究对象，生动展现了革命军人的精神世界。三是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有学者从权力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了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中的责任。敌方的视角也被运用到研究中，如对国民党在胶东军事力量头目赵保原的关注，对太原战役中阎锡山集团的民众动员方式的考察等。

(一)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关于社会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过程，既有研究大多缺乏对各区域差异性的关注，以及对传播过程的动态分析。瞿骏以江南地区为例，论述了社会主义传播的条件、渠道和“落地”的过程，以及社会主义的传播对革命实践的影响。作者指出，便捷的交通条件、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与国外联系互动的人文条件、来自上海的影响、清末民初形成政治组织等因素，使社会主义思想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并影响全国。社会主义思想在被江南人士接受的过程中，与“求世间公道、追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展现出“中国革命强大的内生性”^②。

学界过去对中共创建初期政治主张的探讨，大多以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为依据。郭若平认为，这些决议案能够“反映中共短期和长期的方针政策与奋斗目标”，“却不能显示这种总体方案如何付诸具体革命行动。”这些问题只能“从中共创建初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局势中寻找”。作者以1922—1927年中共针对国内政治局势发布的四次“时局主张(或宣言)”为主要依据，指出

^① 张屹、徐家林：《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中共党史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② 瞿骏：《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中共早期提出通过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推动一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革命”，是因应“时局”的结果，即“因应军阀统治造成的危局及其变化”。作者认为，中共早期因应“时局”而提出的政治主张“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政治位置”，形成了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革命理论的内核和基础^①。

1920年罗素访华，建议中国走苏俄道路，但其游记却批评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新青年》刊发后广为流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发社会主义论战。既有关于这场论战的探讨，大多列举早期中共党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缺乏对其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的分析。蒋凌楠认为，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引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起到了中介作用，特别是山川均的论著。这些从日本引入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一是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二是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三是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对内专政的民主制度，解读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统治。作者指出，通过译介、传播和论战，中共早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以丰富，并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②。

直系军阀吴佩孚对苏俄及其支持的孙中山、中共等政治势力的态度，经历由合作到反对的过程。杨天宏认为，吴佩孚“联俄”并非出于对苏俄道路的政治认同，而是借此对付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组成的反直“三角同盟”。由于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俄存在顾虑，以及为寻求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吴佩孚最终由“联俄”走向“反赤”。吴佩孚的“联俄”举措，表现出其作为“一个军政领袖的不成熟”，“弄得自己敌友不分，进退失据”。其“反赤”的举措，更是“其政治生活中的败笔”，违背了当时追求“赤化”的普遍民意，最终被国民革命军打败，“演绎了近代中国不懂政治却又不得不与闻政治的军政人物的历史悲剧”^③。

“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难辞其咎”。王奇生从“权力机制”和“联络技术”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高度集权的共产国际，一味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不顾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国共产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和模式强行套在各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莫斯科与上海中共中央的通讯不畅，相关情报相互矛盾，造成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的执行困难。上述“权力机制”和“联络技术”导致成员党大多陷入危机或遭到失败，“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④。

过去学界更多关注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熊月之论证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贡献。近代上海存在一种“内嵌式”的国际性。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之上，上海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者关系的权力结构，造成“上海存在诸多管理薄弱地带与隙缝”。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积极而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前者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后者将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领导革命斗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⑤。

关于中共与日共的关系，学界往往关注两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来往，对1945年之前，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来往缺乏关注，或者否认两党在组织层面上有过交流。徐志民发现，早在建党初期，中共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与日共进行了初步合作，并共同指导了台共的创建和革命斗争，对国民党和日本造成一定冲击。中共还积极营救了在中国被捕的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基于共同信仰，中共与日共在白色恐怖年代无畏风险、相互支

① 郭若平：《“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蒋凌楠：《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早期引介——以1920年代山川均译介为中心》，《史林》2021年第4期。

③ 杨天宏：《从“联俄”到“反赤”——吴佩孚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王奇生：《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

⑤ 熊月之：《上海城市的国际性与中共的创立及早期发展》，《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

持、联合斗争，对新时代两党关系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现实启迪。”^①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破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有观点认为桂系的“让路”是中央红军能够胜利走出广西的主要原因。贺金林等认为，“让路”的说法“要么是出于某种目的的捏造，要么就是纯粹就湘江战役某一阶段的片面描述，没有将红军长征经过广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作者认为，中央红军到达广西之前，桂系确实“有一丝给红军让路的想法”，为避免蒋介石借机吞并广西，只能拼尽全力对红军进行堵截。中央红军最终通过广西，“依靠的是广大红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努力”。“让路”说忽略了各个势力之间“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亦存在某一定的阶段或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也是蒋介石将策略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桂系的托词而已^②。

关于向警予被捕后的引渡问题。侯庆斌认为，学界对向警予引渡案的研究“过度依赖时人回忆，以致该事件的本相与影响尚不清晰”。作者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外报刊等史料，认为国民政府为引渡向警予，以“受贿庇共”构陷反对引渡的法国总领事陆公德，并以收回汉口法租界相威胁。在社会舆论和反帝风潮影响下，法国向国民政府做出让步，不仅同意引渡向警予，同时放弃对中共党员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开始配合国民政府在租界搜捕和引渡中共党员。这种处理办法随后被上海等地法租界效仿。这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迁往苏区的原因之一^③。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活跃在闽浙赣边区的游击部队。王才友论述了挺进师游击战略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挺进师初入浙江，试图采取以自身为中心，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协作的“大游击”战略，但这一战略不被闽东和闽北游击区所接受，并引发分歧和争执。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挺进师放弃“大游击”战略，采用各游击区隐蔽斗争、独立作战、协同联动的“小游击”战略，并推行相对和缓的社会经济政策，最终建立起稳固游击根据地，使其所在的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革命支点^④。

许纪霖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精神气质等方面，探讨了大革命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知识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从家庭和少年经历来看，这些知识人大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或者“都有一个残暴的父亲”，再或者都要“逃避包办婚姻”。从教育背景来看，他们主要来自地方师范院校，或者上海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等当时的“野鸡大学”，以及黄埔军校，大多经历过血腥暴力的学潮和运动。从精神气质来看，他们普遍具有“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等四大特质。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使革命知识人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但他们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列宁式政党遵守严密纪律的要求产生内在冲突^⑤。

学界对大革命前后民主集中制的研究略显薄弱。刁含勇以党中央与国统区党组织的权力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实际形态和发展趋势。1927年大革命濒临失败，中央将“民主”和“集中”置于同等地位，推动集中制和民主制并行发展。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弱化的情况下，这些举措导致党内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从中共六大开始，中

① 徐志民：《中共与日共早期关系考（1921—1931）》，《史学月刊》2021年第7期。

② 贺金林、王谦：《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之桂系“让路”说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

③ 侯庆斌：《一九二八年向警予引渡案与中法交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④ 王才友：《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⑤ 许纪霖：《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央通过改组、巡视等方式推进集中制，逐步形成“以集中制为重心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架构和实践形态”^①。

李顿调查团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为了解事变实情而派出的调查小组。调查结果形成《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发展情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陈海懿等发现，日本利用共产主义问题，误导调查团、国际联盟和欧美各国，为其侵华和扶植伪满洲国的正当性进行诡辩。国民政府试图向调查团说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使国民政府的“剿共”受到严重影响，应立即停止侵略，以便其继续“剿共”。日本和国民政府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错误、片面的叙述，使“欧美等国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共产主义’产生忧虑，逐步形成九一八事变与‘共产主义’存在关联性的刻板印象”^②。

(三) 抗日战争时期

金冲及认为，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党内的思想和作风从上到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又能细腻地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切实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从而在四年多后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③。

中共革命史研究缺乏对其他力量的关注，“常常成为自身力量的循环论证”。近年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与中共的合作与斗争渐入学者的视野。郝昭荔考察胶东地区国民党军事头目赵保原部的合作与斗争。赵保原原是伪团长。后领导国共“鲁东抗日联军”。抗战胜利后，赵保原被中共武装消灭。作者认为，加强对他方的研究，“可避免自说自话，有助于全面把握动态的历史发展”^④。

关于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国共两党的战略和决策。张展注意到，日军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认为日军的军事行动在“客观上加速了国共双方的相互妥协”。日军对国共斗争本来采取观望态度，后采取军事进攻以迫使国民政府求和。这迫使原本态度强硬的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共和解，共同出兵抵抗日军。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核心力量卫立煌集团遭受重创，为皖南事变的真正解决提供了条件，“因事变引起的破裂危险已逐渐消弭”。“国、共、日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⑤。

关于“一号作战”，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即“豫湘桂会战”，以及中共在敌后的军事活动。姚江鸿利用国民党、中共、日本和美国等四方的史料，比较研究了国、共对日军的战略预判和战略决策。中共在情报获取，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精准研判、当机立断和上通下达，体现出了“杰出的战略预判能力、娴熟的应对战略危机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预示着中共“已经以一个非常成熟的政党的姿态，出现在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则“犹豫不决，下塞上聋”，屡屡失误，只能被动应对^⑥。

许多学者认为，豫湘桂战役使国民党在河南等地遭受巨大损失，瓦解了其在河南等地的地方势力，为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机。盛差偲通过研究新四军第五师在当地的发展过程后指出，豫湘桂战役的转折意义并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明显。新四军第五师在向南发展过程中遇到

① 刁含勇：《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新探（1927—1933）》，《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陈海懿、郭昭昭：《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研究——基于李顿调查团的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④ 郝昭荔：《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党赵保原部在胶东的合作与博弈》，《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⑤ 张展：《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

⑥ 姚江鸿：《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兼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战略眼光和性格特征》，《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

挫折表明，河南的地方势力并没有瓦解，“国民党军在敌后仍保持相当的实力和政治影响”^①。

学界一般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视为中共整党运动的开端。赵诺利用山西的革命历史档案，考察了晋冀豫根据地开展的整党运动。认为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就在各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是中共进入华北，其组织大发展以后进行的“回应和调适”。晋冀豫根据地在整党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为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划出了界限，对“干部群体的社会构成、内部结构、思想作风等层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特点”，与随后的整风运动“形成接续、呼应关系”^②。

（四）解放战争时期

关于苏联二战后从与国民党结盟到与中共结盟的原因，学界已有“现实利益说”“东西方对抗说”和“意识形态说”等。郝江东指出，“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的互动较以往研究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而若不充分探讨这种复杂性，对双方关系缘起与形成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斯大林最初“既不信任中共也不曾考虑未来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甚至向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明确表达对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从1946年开始，斯大林对中共提供“有限援助”，加强了与中共在东北地区的互动。1948年底至1949年初，斯大林试图通过要求中共提前组建新政权和调停国共内战等方式，控制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努力降低中共的胜利对雅尔塔体系的冲击。中共对此予以拒绝，迫使斯大林重新审视中国革命。1949年1—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开启了与中共结盟的过程。文章指出：“决定战后初期中国局势走向的，不是美苏等大国的意志，而是中国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③。

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

本年度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党史研究，在过去较为薄弱的经济史领域成果显著。一些过去被忽视的经济问题得到关注，如农业合作社的会计制度、养猪业中的“粮猪经济”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做出的经济决策的史实得到考订。有经济学者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系统估算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贫富差距。本年度研究的另一特点，是更加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境遇。对上海“新三反”运动中黄逸峰事件的研究，展现了社会运动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有学者利用上海青年学生日记，探讨新中国初期青年学生精神重塑的内外动因。此外，与工人阶级相关的诸多问题成为本年度的热点，不仅受到党史、国史研究者的关注，还吸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入探讨。政治学者论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如何在“五反”运动中得到确立。社会学者运用洛阳矿山机器厂59名员工的口述访谈，讨论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与继承。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以往对上海“新三反”运动中黄逸峰事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黄的个人命运以及新闻媒体在其中的导向作用，但对其前因后果及其对整党建政工作的影响关注不多。徐锋华指出，黄逸峰本人经历了从开始的拒不合作到后来的积极配合，心路历程经历巨大转变，显示出舆论动员下社会运动的巨大威力，其个人命运随之发生重大转折。这一事件对克服官僚主义、压制批评意见影响很大，是整党建政的一个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央为防止党政干部被权力腐蚀、不论职位高低都必

① 盛差德：《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的发展与调适》，《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赵诺：《中共晋冀豫根据地的“1940年整党”》，《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郝江东：《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共政策的缘起与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以运动方式进行执政党建设,必然会掺杂着某种非理性因素;而且不用法治、民主的方法对待党内同志,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尽管处理黄逸峰的方式方法可以商榷,但共产党整党建党、廉政为民的良苦用心却昭然可见,其真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①。

以往学界对新中国初期个人日记的讨论,主要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和各类政治运动对个人的形塑,却忽视个体在被塑造的过程中的能动性和过程性。王余意、周晓虹以上海青年学生舒文秉的日记为例,使用社会表征理论和认同过程理论,通过对图景描摹、国庆仪式和交谊舞三大事例的分析,探讨青年知识人精神重塑的内外动因。作者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通过锚定与具体化机制,将社会主义表征嵌入青年的意识之中,使得新社会的图景被构想和复述;国家借助国庆仪式这一操演方式,从觉知、理解、接受、吸收和突显等五个层面,将社会主义及其“新人”的表征诉诸青年知识人的认知与情感;同时辅之以对包括舞会在内的日常生活及休闲方式的改造和身体规训,有效地激发了青年的自尊、连续性、特殊性和自我效能感^②。

学界关于土改整党试点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反“左”纠偏之前,而对于其后的乡村建党建政实践的梳理尚不够完善和清晰。邓宏琴、马维强发现,潞城县的土改整党并非有学者指出的,在其反“左”纠偏后就戛然而止,建党建政亦被暂时搁置。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也低估了革命的复杂性及中共面对危机的沉着应对能力。事实上,尽管面临干部队伍瘫痪、出现大量冤案错案,农村宗族、私仇及干群矛盾错综复杂,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失控迹象等困境,中共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整党试点任务,而且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进行了结束土改和系统整党的工作。1948年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工作由“工作队进村”“整编贫雇农和党内整党”“开门整党”“反‘左’纠偏”“建党建政”等几个阶段组成。而在非试点村则先结束土改,然后集中全力进行系统整党建政^③。

常明明梳理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的演进历程,讨论社改对小商小贩经营及城乡商品流通的影响及国家的应对之策,揭示了农村小商小贩社改的复杂面相。农村小商小贩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先后经历了“先安排,后改造”“主要改造,继续安排”及“整顿调整,巩固成果”三个阶段,被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集体组织形式。在社改过程中,一方面造成诸多农村小商小贩经营困难,为数不少的小商小贩转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导致城乡物资交流发生阻滞。中国地域辽阔,农民需求千差万别,小商小贩固有的分散性、流动性、灵活性等经营特性,能够满足分散农民多样化的需求,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中仍具不可替代的作用。有鉴于此,人民政府和供销合作社不得不适时调整政策,利用小商小贩的经营特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④。

1950年代,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多次出现规模较大“毛人水怪”的谣言恐慌。赵凯欣等人利用档案材料和田野访谈,对这一事件进行社会历史学的研究。作者将县级政权对谣言的处理政策放置在诸级政权之间的互动之中,对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进行了社会学思路的再考察。本文指出,在理解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时,不能将之视作铁板一块。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或“严厉”的措施的实施,还是“群众闹事”或“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县级

① 徐锋华:《“黄逸峰事件”与上海“新三反”运动》,《史林》2021年第4期。

② 王余意、周晓虹:《“新人”的塑造:社会表征与个体认同——以青年学生舒文秉的日记(1951—1955)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

③ 邓宏琴、马维强:《何去何从:山西潞城县后期土改整党试点研究》,《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

④ 常明明:《进退的张力: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4—1956)》,《史林》2021年第1期。

政权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①。

有研究指出，国家用神圣化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强调信仰、奉行节俭和奉献的“苦行者”。林超超认为，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过高估计了国家意志的统一性、连贯性，以及对其他行为主体的强制力。中共建政初期，崇俭的消费伦理的回归，与“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提倡节俭既可以实现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又可以抑制消费需求，减轻对供给的压力。为此，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消费、储蓄等私人行为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大众媒体承担了宣扬和解释新的消费伦理的功能，并能根据社会舆论的反馈，不断调整其宣传口径。不论是“先生产、后生活”“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还是后来的“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的说法，都将民众需求的正当性让位于国家战略的至高性^②。

郭子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凭借其在美术印刷业的优势地位，成为全国领袖像制作发行的中心之一。1949—1954年，私人制售是上海领袖像制作发行的主要方式，与延安时期形成的自上而下、计划统一的生产模式存在差异，难以满足新政权对“政治宣传的统一计划”。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市宣传文化部门开始管理领袖像的出版、流通，最终在对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领袖像生产业务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私商成为国家出版发行体系的一部分。作者认为，上述过程反映了“新政权与原有社会特定行业的固有结构产生的冲突”^③。

既有研究大多将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作为统一财经的起点。闫茂旭认为，中共统一财经工作实际上发轫于1946年9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庞村会议”，其目的在于加强财经工作领导、支援解放战争需要。后经1947年3月的华北财经会议、1948年3月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直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才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前的统一财经工作中的“焦点和难点”是统一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相关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财经管理体制，“建构了制度框架和政策基础”^④。

既有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对进出口贸易行业的关注较少。严宇鸣运用上海档案馆的史料，考察了新中国初期国家对进出口私商的管理和改造过程。新中国成立后，进出口私商以及相应的市场运作机制仍然存在。上海口岸不断调整对进出口私商的管理制度，先后采取了“自进自出”“公进私出”等业务分配制度，并实施了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下的联营，最终实现公私合营，将进出口私商纳入到了国家计划体系中^⑤。

郑维伟考察了上海“五反”运动中工会、工人阶级和工商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市总工会在市委和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领导下，与青年团相配合，大规模发动青年工人斗争工商业者；通过举办高级职员训练班、座谈会等方式，逐步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工会不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将其纳入党群组织中，同时教育或淘汰落后分子，进而使其不断嵌入社会，成为“政治动员和社会统合的基本工具”。由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开始从名义变

① 赵凯欣、李俊杰、严飞、侯晋轩：《平谣术：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治理（1953—1954）研究》，《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

② 林超超：《新消费伦理的建构及其制度逻辑（1949—1956）——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21年第6期。

③ 郭子健：《从私人制售到计划生产：领袖像在上海的出版、流通及国营化（1949—1954）》，《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④ 闫茂旭：《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缘起与初步实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严宇鸣：《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出口私商的管理制度变革——基于上海口岸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为现实”^①。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薄一波确认：“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明确提出来了，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没有作出具体部署”。李博等认为薄一波说“其事实有重大遗漏”。明确提出试办托拉斯的时间，应是1960年3月25日。此时国民经济尚未开始调整，距“八字方针”的提出还有9个月。试办托拉斯提出后，中央及相关部门以报告会、考察讲话、批转报告、舆论引导等形式进行部署，各地则利用现场会、典型示范、组织实体等形式响应中央。因此并非“没有做出具体部署”^②。

国家希望知青留在农村与农民一起过“革命化春节”，借此将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春节新礼俗渗透到农民的生活之中。丘新洋发现，大多数知青坚持回城过年，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愿以偿。这说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是毫无弹性的”，加之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和监督不算严格”，为知青回城过春节“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革命化春节”是“很难被群众广泛接受的过于理想化的政策”。这既是“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极左思潮的一种抵制，也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对世俗生活的普遍追求”^③。

常江潇等通过对洛阳矿山机器厂59名员工的口述访谈，讨论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作者指出，洛阳矿山机器厂通过班前会、标准化生产等方式实现了对工人的制度规训，同时又通过塑造主人翁意识、政治动员、劳动竞赛、国家危机叙事和树立焦裕禄等模范典型，锻造出工人阶级的意义感。由此消解了纪律和意义感之间的张力，使“‘守纪’和‘做主’成为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缓冲了对工人的严格管束可能带来的对其创造性的挫伤及管理机构官僚主义的滋生。”^④

(三) 改革开放时期

张琦考察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范式的深刻改变。这次会议的背景，一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二是1984年底到1985年初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势头。这次会议后，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从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转换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因此，“巴山轮会议”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新旧范式转换的分水岭”^⑤。

关于1978—2000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人物和文本的梳理，无法“解释思想变迁背后的逻辑”。黄晨运用知识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概念，将这一时期思想界分为“理论界”“公共知识界”和“专业学术界”等三个场域。80年代中期之前，理论界场域主导中国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题从革命变成了改革和解放思想，“风向是高度一致的”。80年代中后期，公共知识界场域诞生并发展，“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笼统的现代化思想”等兴起，并影响社会大众。90年代国家开始对知识界进行治理整顿，“孕育了最庞大的专业学术界场域”。职业化专家和学者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自身学科建设展开，“或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政治思想在社会中开始被边缘化^⑥。

① 郑维伟：《政治动员与阶层分化：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人群体析论》，《史林》2021年第2期。

② 李博、李端祥：《“试办托拉斯”若干判断的考析——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6期。

③ 丘新洋：《一九七〇年“革命化春节”研究——以厦门知青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常江潇、周晓虹：《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以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⑤ 张琦：《“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⑥ 黄晨：《场域决定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1978—2000）》，《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杨凤城等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孔子认识的演进历程。改开初期中共首先突破简单化的阶级认知标准，逐步提倡和支持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学术研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共开始强调孔子以及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和意义，“实质上是对‘中西文化差异’困扰和影响中国一百多年的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视野出发，对孔子及其思想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并将其运用于治国理政。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全面，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科学”^①。

朱晓艳等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的出台背景、过程及其意义。面对经济落后、科技力量薄弱的国情，中共对中国要不要开展高科技研究、要不要实现高科技产业化以及高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探索。1992年前后，决定成立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确立以“高新区”为主要方式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我国后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②。

付吉佐指出，1978年以后，中共在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上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二是以“半介入”的方式，支持学界对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三是强调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和意义。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定位的过程”。其原因是该时期中共“面临的反封建与反自由化的双重历史使命”^③。

赵胜梳理了改革开放初期海南地区人民公社与国营农场土地纠纷的由来、爆发过程和化解方法。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数次变动，导致公社和国营农场的土地界限模糊不清。改革开放后，公社农民频频强占国营农场土地，抢收农场橡胶、砍伐农场防护林。冲突事件频发，甚至动用步枪、机关枪，造成人员死伤。1980年5月，习仲勋亲赴海南进行调研，推动国务院出台“202”号文件即《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该年8月，广东省委出台一系列化解方案，如联营、互换、让地或合并等，“最终成功地将土地纠纷问题纳入至整个海南长远经济发展的大蓝图中加以解决，从而实现了国营农场与人民公社农民之间关系从紧张到融合的转变”^④。

结束语

2021年两史研究在呼应主旋律、提出新观点、挖掘新史料、拓展新领域、使用新方法尤其是在学科融合方面均取得不俗的成绩。本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上文已有概述，恕不重复。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学者贡献了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学术论文，有的作者还是第一次在本综述中遇见。毋庸讳言，笔者从中发现有些青年学人在学术史梳理的规范、借鉴其他学科的理念与方法等方面，还有可商榷和讨论的空间。本文不揣浅陋，提两点愚见，仅供年轻同仁参考。

其一，学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或依赖学术史梳理的规范。一些作者对学术史梳理在论文中的功能和作用不甚了解，以为学术史梳理就是列举与自己论题有关的论著。有的文章甚至只是在注释中罗列有关论著的题目和出处。在没有对这些论著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情况下，就贸然指摘这些作品对此项研究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在某些方面尚待提高等等。这种模棱两可、

① 杨凤城、付吉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孔子认识的变化与演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② 朱晓艳、杜磊：《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对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5期。

③ 付吉佐：《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年中共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调整》，《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④ 赵胜：《从紧张到融合：改革开放初期海南农村土地纠纷的化解》，《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

无的放矢的批评,不仅无助于甚至不可能找到本文的对话对象,难以在与已有研究的对比中提出自己的创见,以形成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这种自说自话式的所谓学术史梳理,等于没有和既有研究发生碰撞和交流,其结果往往是其他的研究者也不太可能讨论和分析你的研究。那么,你的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进入学术史呢?

实际上,学术史梳理是一件特别考验研究者学术功力的、繁难的工作。愚以为,这项工作首先要梳理本研究论题的源流。回答这项研究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中间经过了哪几个阶段;有哪些主要观点,其主要分歧是什么等等。其次,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找出与本文论题有直接关系的论点进行分析和批评,指出前人的主要贡献和对你的启发,更要紧的是发现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和漏洞。这些问题和漏洞,正是本文突破和创新的起点。显然,没有对话和对比,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创新。最后,形成自己独创性的贯穿全文的主要论点(命题),在没有完成论证之前也可叫理论假设。本文的谋篇布局、材料取舍等都需围绕着论证这一命题来展开。这里再唠叨一句,在文章的结语中需要正面回答,本文是否证明了在前言中提出的理论假设,以实现前后呼应。

上述这套规定动作在一篇论文中的确难以全部完成,但若删繁就简,完成其关键部分,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和对比中提出新的见解,却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其二,两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应该以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为前提。本年度讨论党史学科的性质和归属的若干篇文章也坚持了这一立场。以愚的观察,与历史学联姻比较成功且得到同行认可者,莫过于所谓“历史社会学”。以社会学的理念、方法书写的历史,热衷于揭示历史的“结构”,描述历史运行的“机制”,其研究旨趣集中于回答“为什么”。在传统史家看来,按此套路书写的历史,难免按其“结构”而不是史实本身的演变逻辑来裁剪史料。历史书写特有的历时性、历史过程的完整性不免模糊和变形,甚至比史学更易陷于“史从论出”。历史学独特的理念和表达方式规定了其以回答“是什么”为旨归,叙述曲折、生动的历史过程,不下或不直接下明确的结论,间接启发读者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历史学者不奢望历史书写的绝对客观和绝对真实,不苛求发现唯一的结论,只是尽量展现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这就要求史家尽量还原古人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模式。陈寅恪研究思想史的心得同样适用于两史研究。他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对古人和往事任意褒贬,显然有违历史学的旨趣和规范。概言之,两史研究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借鉴和交融,但要以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为前提。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上海 20024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王昌]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9页。